

要警惕新的“洋八股”

——由延安时期“反对党八股”想到的

杨 柳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 办公室,安徽 合肥 230059)

摘要:今天,不良文风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中“洋八股”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把反对不良文风——“党八股”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联系起来,实行综合性治理,今天警惕“洋八股”的危害,也应该如此。要注意到它的多方面联系及其成因,真正做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以重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关键词:不良文风;洋八股;综合性治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638(2015)03-0025-04

近年来,文风问题引起人们普遍关注。文风应以纯正为美,不良文风的共同之处是对纯正文风的背离。人们认识到不良文风败坏了接受者的口味,损害了群众对社会的信任,污染了精神文明。就如习近平所深刻指出的:“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1]不良文风与不良社会风气、与党内不正之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能找准不良文风的主要特征,找出产生它的社会根源,就很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本文拟从这个方面谈一点看法。

一、反对“党八股”的经验

在这里,笔者不禁想起延安整风中反对“党八股”的经验。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不良文风称之为“党八股”。“八股文”原是古代应试制度的产物,起于宋

朝,后来成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专门文体,在演变过程中变成了一种固定、僵化的程式,生硬搬弄古人经文典则,不讲求客观实际,不注重真才实学,堕入形式主义。所谓“党八股”,是指发生在共产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八股”文风。毛泽东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2]⁸³¹这种“洋八股”是在五四后学习外国、学习西方过程中出现的,要害是脱离中国的实际,生硬搬弄外国人的东西。鲁迅批评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3]就是说,这种“洋八股”不去研究中国“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搬了外国人的,或者是权威的“公式”、理论,生硬演绎,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丧失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针对“党八股”,毛泽东列出“八大罪状”:一

收稿日期:2014-12-09

作者简介:杨柳(1978-),女,安徽合肥人。研究方向:社会管理。

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三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四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五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六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七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八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八条之中，第六到第八条是就其危害性而言的，第一到第五条则是其表现形式。在论述“党八股”的时候，毛泽东把这种不良文风同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思想作风联系起来考察。他提出，这种不良文风与党内三四十年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密切相关。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离开中国的实际，生硬搬弄马克思主义词句和共产国际的指令指导中国革命，并且以此画线，拉山头搞宗派，涣散了党的团结，这便产生了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和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所以在整顿文风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必须“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毛泽东说，“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总是“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2]831}。所以毛泽东把整顿“三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时提出，当做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实行综合性治理，指出整顿好了文风，也就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失去了藏身之所。

而对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批判，他尤其重视。他指出：“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2]845}“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2]845}正是在这个背景上，全党开展了普遍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整顿三风的运动。经过这次生动活泼、卓有成效的整风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才得以正式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才正式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关，不良文风“党八股”才得到认真清算。

二、要警惕“洋八股”

今天的形势与延安时期已经不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良文风的表现形式也变得复杂、多样。但有一点却极为相似，那就是“洋八股”。这种“洋八股”，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在对待共产国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产生的，在今天则是在对待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问题上产生的。取向虽然不同，但染有这种文风的人都是不立足中国的现实，不是从中国“新的事实，新的现象”出发，而是盲目照搬外国的经验和理论，“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

今天，一些人总喜欢离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无视中国的特点，把学习西方变成照搬西方，以西化为时髦，西方话语满天飞，“言必称希腊”。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则对不住，采取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无所顾忌地“解构”了之。习近平所概括的不良文风的主要表现“长、空、假”^[1]，要害即在于不问中国实际，不问中国历史，疏离中国国情，缺乏实事求是之意，贩卖和炫耀西方话语。“长”，长篇大论，夸夸其谈，出口“模式”，闭口“体系”，充当文化掮客；“空”，凌虚架空，离题万里，不落实处，空洞无物，端着架子吓人；“假”，脱离中国实际，以洋乱真，掩盖存在问题，模棱两可，让人摸不透。

这种不良文风与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不正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处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西化思潮泛滥不止，这股思潮泛滥是缺乏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在经济领域搬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混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区别，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解为“市场唯一”，反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更好发挥政府对经济社会运行中的计划统筹、宏观调控、收入分配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的领导作用；在政治领域鼓吹“多党制”和资产阶级“宪政”，把共产党领导的“依宪治国”歪曲为资产阶级宪政；在思想文化领域宣扬所谓“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对立，消解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消解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这股思潮

败坏了社会风气,也败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以致催生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这些年出现的“洋八股”,正是这种不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以及影响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错误思潮在文事活动中的具体反映。毛泽东说,不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总是“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习近平也说:“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文风与党风同社会风气是紧密相连的,弘扬优良文风、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1]正因为这样,要实现文风的好转,必须解决好这“决定着文风”的党风及社会风气,清算影响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错误思潮。

对于社会风气和党风中的存在问题,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还在1986年,邓小平就说过:“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4]中央自2013年6月以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明显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深刻教育,精神上补了“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对“四风”问题进行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刹住了“四风”蔓延势头;恢复和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探索了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得到增强;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随着党风的好转,社会风气也呈现出向上、向善的健康景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回应。

与此相关,文风也趋向好转。全社会对不良文风的批评,就是一个趋向良性发展的前兆。报刊、网络大量出现关于“中国表达”、“中国叙述”、“中国气质”等等的呼声,都表明“洋八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但这才是开头,文风的治理也如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治理一样,还要下大工夫,并且要始终注意到不良文风的社会联系,要在综

合性治理上用力气。就治理“洋八股”来说,要立足改革中的中国现实,要始终清楚地知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固然需要重视学习西方,但我们又要始终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办中国的事情,我们的言说固然要学习外国人新鲜的、对我们有用的语言,但就其根本而言,也主要是来自历史、来自中国老百姓的中国言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重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毛泽东针对“洋八股”“言必称希腊”的现象提出来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性格及其话语风格。它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吸纳其他民族的优长为自己所用,但万变不离其“宗”,不弃其“本”,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文化基因,民族中人在时代变迁过程中会不断地丰富它,但不能丢失它。大体说来,就“中国作风”来说,讲求“实事求是”;就“中国气派”来说,讲求和而不同。到了现代,共产党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宗旨,所以毛泽东又特别强调话语表达必须“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就是说,处在中西交汇的世界背景上,我们的文风应该是实事求是、风格多样、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就要求“洋八股”必须休息,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

改造文风,警惕“洋八股”,需要人们共同努力,但“洋八股”总是通过具体的文化工作者和写作者呈现出来,所以要克服不良文风,文化工作者和写作者无疑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就是说,写作主体能够意气骏爽而不浑浑噩噩,他的文风就会自然清俊。所以努力打造伟魅雄强的主体人格便成为文化工作者和写作者持之以恒的必修课程。南宋诗人陆游说:“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燭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为金石之声,潢汙不能为江海之涛澜,犬不能为虎豹之炳蔚,而或谓庸人以浮文眩世也,乌有此理也哉?使诚有之,则所可眩者,亦庸也。”^[5]他教导儿子“功夫在诗外”。这“诗外”的“功夫”就是发愤学习、加强历练、修养心性。今天,要警惕“洋八股”当然有许多事情要做,譬如学习中外优秀文化,重新认识民族传统,加强文字训练,等等,但尤其需要针对“洋八股”的成因,在改

进思想作风和拒绝不良社会风气上下工夫,增强对错误社会思潮的鉴别力。通过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根本之处“意气骏爽”了,遇事、说话、写文章也就不至于丢掉了老祖宗,不至于“言必称希腊”。这里面有两点,尤其应该予以重视:

其一,必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经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而作出的唯一正确选择。近百年来,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探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可谓备尝艰辛,艰苦卓绝。这中间有改良主义,有“全盘西化”,结果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才找到了希望。建国以后,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并为此作了许多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观点支持,给出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改革开放以来,面临国内外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虽然还要不断完善,但基本框架、思路,对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表述显示了无比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因此,克服不良文风,反对“洋八股”,文化工作者和写作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坚定不移。如果在这

个问题上是非不清,就势必失去定力,势必西风来了西边倒,东风来了东边倒,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

其二,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立足中国的实际,深入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掌握丰富的感性材料。

只有从中国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只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新语言、新表达、新风格,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会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譬如要反映农村的改革,就应该深入农村的实际,看看那里的真实情况,看看那里从事劳动生产的是什么人,他们如何从事劳动生产,从而提炼出实事求是的观点,形成符合老百姓愿意听的话语表达。如果一味地搬弄西方的一些概念,来演绎中国的实际,那就会牛头不对马嘴。在中国的环境里,如果硬是要充当“文化掇客”,打造一个西方的“山寨版”,其结果不但叫人不知所云,而且会把事情搞坏,走到邪路上去。当然也不是不能学习西方的话语,但牛吃了草还应该是强壮的牛,而不要成了身上长满草的奇形怪状的怪物。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J]. 求是, 2010, (10): 3-7.
-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
- [3] 鲁迅. 伪自由书·透底[C]//鲁迅全集:第5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05-106.
- [4] 邓小平.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C]//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154.
- [5] 陆游. 上辛给事书[C]//陆游集·渭南文集:5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2087.

To Be Vigilant Against New “Foreign Stereotyped Writing” —Thinking from “Objection to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Yan’an YANG Liu

(Office of Anhui Economic Management Institute, Hefei 230059,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 form of bad writing style is diverse, and “Foreign Stereotyped Writing” is obvious. During the period of Yan’an Rectification, Mao Zedong connected the objection to bad writing style—“Party Stereotyped Writing” with that to subjectivism and sectarianism, and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At present, it should be done in the same way to be vigilant against the harm of “Foreign Stereotyped Writing”. Various kinds of connections and cause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Self-confidence of theory, road and system should be achieved truly. Marxism practice view should be set up, so as to revive Chinese specific style and manner.

Keywords: bad style; Foreign Stereotyped Writing;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manner

[责任编辑:张 兵]